

## 錢穆論人文主義教育的失落與重建

陳以愛

### 摘 要

大學與人類文明進程的關係，是向來備受矚目的政治、社會、文化議題。中國人口眾多，中國大學的歷史沿革及未來走向，自是關切人類文明者所不會忽略的重要課題。本文以錢穆對現代中國大學的沉思和建言為考察對象，是基於三個理由：第一，錢穆是一位思想者兼行動者，他在中國教育界工作逾 70 個年頭，是現代中國大學的重要歷史見證人。第二，錢穆始終自覺地思考大學在現代文明中的社會功能和價值，對現代中國大學的重要特徵作過深入考察。第三，錢穆留下極為豐碩的文化及教育著作，藉由他的視角可以抉發出許多值得關注的面向。本文的研究指出，錢穆是一位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革新者，也是一位深具文化意識的人文主義者。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概括錢穆的教育理想，也是他教育理念的最後歸宿。本文勾勒錢穆對現代中國大學的批評，探討他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兼及他對文化主體性在現代中國的失落和重建，大學文科教育的地域性和世界性面向之論述。本人相信對錢穆教育理念的探討，對當代中國人文意識的重建將提供參考作用。

關鍵詞：錢穆、大學、文化、人文主義

# Qian Mu's on the Re-building of Lost Humanist Education in Colleges

Joseffin Sae-chen\*

##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lways attracts scholars' attention. Chinese scholars, who are concerned with and about humanist civilization, will certainly not ignore their universities and their future trend for China's large population. There are three major reasons for studying such a prominent scholar as Qian Mu in this specific case. First, as a major thinker and a serious actionist, Qian had taught at various Chines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for more than 70 years. He was a most important witness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universities. Secondly, Qian always consciously thought about what social functions and values universities should possess and the role they should play in modern civilization. To do this, he had mad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shared by moder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irdly, Qian left behind a rich legacy of writings 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His perspective here can surely help scholars to discover aspects that are worth of scholarly attention. While this research discovers Qian to be reformer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value, he was also a humanist with a deep cultural awareness. His ideal of education is humaneness, which is also the essence of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is study outlines Qian's criticism of modern Chinese universities, besides an exploration of his proposed education reform programs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into his opinions abou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st cultural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and his discussion of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function of liberal

---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Tunghai University

arts education at universities. The author of this research believes that such an investigation into Qian'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will provide insight into and for a reconstruct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uman consciousness.

**Keywords: Qian Mu, universities, culture, humanism**



# 錢穆論人文主義教育的失落與重建\*

陳以愛\*\*

## 壹、引言

19 世紀末以來近代中國大學的建立，有三個主要背景和趨向：第一、大學是中國人在歐美國家的軍事和經濟挑戰下，為了擺脫「亡國滅種」危機，尋求「富國強兵」的現代性方案。第二、大學是現代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失去自信心以後，在「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心理下引進的文化舶來品。第三、大學是成立於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橫決、人文意識低落的時代。基於這三大背景和趨向，近代中國大學呈現下面特徵：教育為民族國家的利益服務、崇尚西方近代學問、重視技術性知識。<sup>1</sup> 此三大特徵的對立面，是普遍性的文化意識、古典中學、人文主義的教育。然而，過去一個世紀裡面，前者卻對後者造成強大壓抑，反省的聲音不是沒有，卻從未成為思想的主流。踏入 21 世紀，中國大學面對的外在環境更加複雜，市場化成為高等教育的絕大挑戰。與此同時，對大學理念的主體性思考，包

---

\* 本文為香港中文大學 50 週年校慶而作，初稿在 2013 年 12 月 9-10 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辦的「中大史學五十年」學術研討會宣讀，原訂題目為〈錢穆論大學改制與文科教育的使命——一位人文主義者對大學的沉思和建議〉，感謝譚汝謙、陳榮開、杜榮佳諸位教授在會上的指教。本文投稿期間，也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賜教。

收稿日期：2014 年 9 月 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 年 12 月 16 日。

\*\* 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sup>1</sup> 金岳霖，〈當代中國的教育——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中國問題座談會」上的講演〉（1943 年），收入劉培育編，《道、自然與人——金岳霖英文論著全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 年），頁 387-395；陳錫恩，〈中國的教育〉，收入薛光前主編，《艱苦建國的十年》（臺北：正中書局，1971 年），頁 275-300。

括回溯近代大學的潛在傳統，正成為當代學者關切的課題。在「反思前一世紀教育」的聲音中，挖掘過去備受忽略或排斥的教育論述，對當代人思考大學問題有正面的啟示意義。

本文以錢穆的教育論述為考察對象，主要有幾個理由：首先，錢穆是一位思想者兼行動者，他在教育界工作逾 70 年，是現代中國大學的歷史見證人。其次，錢穆作為一位歷史學者，始終高度自覺地思考大學在現代文明中的社會功能和價值，對現代大學的特徵也作過深入探討。而且，錢穆留下極為豐富的文化及教育論著，藉由他的視角可以挖掘出不少值得關注的現象。不過，選定錢穆作為探討的對象，想要透過他的視野來考察現代中國大學的危機和改革契機時，必須先瞭解到錢穆並非像一般人所誤解的是一位反對革新、反對西方價值的守舊人物；實際上，毋寧說錢穆是中國傳統價值的革新者，<sup>2</sup> 更是一位深富文化意識的人文主義者。正因為錢穆秉持人文主義的理想，使得他在教育主張上有時顯得相當「激進」，例如他批判黨國體制對教育的干預，抨擊學者過信科學的功能及價值，撻伐大學教育的實用主義傾向、缺乏超越性的文化理想與人文意識。總之，我們必須瞭解錢穆的人文主義者身分，才能明白他的教育論述之底蘊所在。在這方面，錢穆表現得與他推崇的宋代儒者相似，我們不妨將其視為欲「將理想來徹底改造現實」的革新派人物。<sup>3</sup>

由這樣的認識做為基礎，本文旨在勾勒錢穆對近代中國大學的批評和主張，闡明他的教育改革方案。本人前撰一文〈錢穆論政學關係〉，梳理了他對大學與政術的關係之論調，本文擬說明他對文化主體性在近代中國失落和重建之途的省思。最後，將探討錢穆對民族國家文化主體性的論述，是否與他的人文主義教育理想相衝突？在論述的架構上，以時間為序，從三個歷史段落展開論述，即抗戰時期、創辦新亞書院時期、籌辦香港中文大學時期，以期呈現錢穆人文主義教育理念之完整歷史脈絡。

---

<sup>2</sup> 余英時就認為錢穆的歷史工作是為了達到「傳統的更新」。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頁39-41。

<sup>3</sup> 陳以愛，〈錢穆論政學關係〉，《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2年第2期（2012年4月），頁154-178。

## 貳、抗戰時期：大學改制的理由與方案

「竊謂將來之新大學，應以單獨學院為原則。」

—— 1940年，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

從清末辦新教育算起至抗戰時期，中國大學走過了大半個世紀的道路，學院中人對大學教育發出不少檢討的聲音。當時錢穆以大學教授身分，也提出他對中國大學教育的反省之思。其中，最重要的兩篇文章應為〈改革大學制度議〉（1940年）及〈理想的大學〉（1943年）。<sup>4</sup> 錢穆在這兩篇文章中，把矛頭指向實用主義主導下的專業教育及職業教育，認為根本有悖於人才教育、文化教育的理想。同時，他嚴詞批評大學教育只偏重智識教育，忽略人格教育與道德教育。另一方面，他從積極面提出改革大學院校組織的新構想，認為應以養成「通人」為目的。他這一時期的教育論述，後來因為政局變動而未能實現；但其中的若干主張，隨後表現在香港新亞書院的創辦理念中。因此，不論就瞭解 20 世紀前期中國大學的角度看，或就認識香港新亞書院的創辦背景而言，這兩篇文章都很值得重視。本節便以這兩篇文獻為主要依據，考察錢穆在 1949 年以前的教育理念。

### 一、「分崩離析」的社會

錢穆在〈改革大學制度議〉一文開宗明義地提出，大學教育與政治、社會領袖的養成有密切關係。沒有理想的大學教育，就不可能有社會上的領袖人才。他宣稱：

今日大學教育有一至要之任務，厥為「政術」與「學術」之聯繫。抗戰期間，後方政治之重要，不亞於前線之軍事，其理盡人皆知。而抗戰結束以後，百孔千瘡，萬端待理，政治事業之重要與其艱鉅，更將十百倍於今日。而政治事業之推動與支持，則首賴於「人才」。人才之培養，

<sup>4</sup> 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原刊於 1940 年 12 月 1 日《（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理想的大學〉原刊於《思想與時代》，第 12 期（1943 年 3 月），均收氏著，《文化與思想》，《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41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195-215。

繫惟大學教育之責。抑政治事業，就廣義言之，不僅於居官從政。社會各方面各部門種種事業之推動支持，均有賴於適當之人才。亦必俟社會各方面各部門事業均有適當人才為之推動支持，而後其政治乃有基礎可以發皇。在朝在野，相得益彰。此項社會各色中堅領袖人才之培養，亦惟大學教育之責。而不幸吾國最近二十年間大學教育之精神，似未注意於此。<sup>5</sup>

這是錢穆對近代中國大學教育的嚴厲批判。他認為 20 年來大學教育不注意社會人才培養的重要性，這一結果到抗戰時期給人特別痛切的感受。

錢穆緊接著檢討 20 年來大學的辦學績效，認為普遍所重視的有三大標準：「一曰校舍之建築。二曰圖書儀器以及衛生體育種種物質上之設備。三曰院系之擴展，教師之羅致，以及課程之增新。」<sup>6</sup> 這三項中，他認為最為重要的是教師和課程：

第三項當為大學教育最高目的所在。然僅僅注重於智識之傳授，無當於人格之鍛鍊〔、〕品性之陶冶，識者譏之，謂此乃一種智識之裨販。大學譬如百貨商店，講堂則其叫賣銜鬻之所。<sup>7</sup>

這是他批評大學只重視智識傳授，忽略了人格教育及道德教育。就智識教育而言，又不能免於「裨販」的商品化現象。總之，錢穆感慨大學已淪為販賣知識的市場。

錢穆進一步考察中國大學智識教育的內涵，認為多年來的專業化走向，已經造成令人憂心的現象，就是大學畢業生成為社會上孤立的個人，其結果是國家社會日見衝突，人們無法攜手成就共同事業。錢穆認為其關鍵之所繫，端在各院系自築牆垣、自為疆域。但他認為：

夫學術本無界劃，智識貴能會通。今使二十左右之青年，初入大學，茫無準則，先從事各人之選科。若者習文學，若者習歷史，若者習哲學，若者習政治、經濟、教育。各築垣牆，自為疆境。學者不察，以謂治文

<sup>5</sup> 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頁 195。

<sup>6</sup> 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頁 196。

<sup>7</sup> 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頁 196。

學者可以不修歷史；治歷史者可以不知哲學；治哲學者可以不問政治。如此以往，在彼自以為專門之絕業，而在世則實增一不通之愚人。而國家社會各色各門中堅領袖人物，則仍當於曾受大學教育之學者中求之。生心害事，以各不相通之人物，而相互從事於國家社會共通之事業，幾乎而不見其日趨於矛盾衝突，分崩離析，而永無相與以有成之日。<sup>8</sup>

錢穆痛陳 20 年來大學專業化教育的結果，是造成「各不相通之人物」，導致社會的分崩離析。這一論調，不禁令人想起美國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 (Robert M. Hutchins) 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批判。赫欽斯認為，大學應負責重新塑造社會的「共同核心」，以導正高等教育專業化後的嚴重社會分化。<sup>9</sup> 錢穆和赫欽斯兩人不相聞問，卻不約而同對專業化提出嚴重警告，是很有意思的東西對照。<sup>10</sup>

錢穆更以他熟悉的文學院為例，批評專業化使大學培養不出合格的中學國文教師。他描述大學國文系的情形：

國難以前，國內最負時譽之大學，莫不競務於院系之析置，教授之羅聘，以及課程之繁列。一學系教授往往至七八人，課目往往至一二十門。而此等課目，則皆此等教授之專門絕業。二十左右之青年，初入大學，茫無準則，於選科之外，又繼之以選課。治文學者，或治甲骨鐘鼎，或治音韻小學，或治傳奇戲劇，或治文藝創作，亦復各築垣牆，自為疆域。其於文學之大體，則茫然也。其他治歷史哲學以往者，亦復爾爾。……今日一大學國文系畢業之學生，即深感不能擔負中學國文教員之重任。何者？彼之所治，乃專門絕業，如甲骨、鐘鼎、音韻、小學、傳奇、戲曲、文藝創作之類，皆非中學國文課所需。中學國文課所需者，乃一略通本國文字文學大義之人才，而今日大學教育，即絕不注意及此。<sup>11</sup>

<sup>8</sup> 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頁 196-197。

<sup>9</sup>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pp. 59-87.

<sup>10</sup> 近年中國重視通識教育的學人相當重視赫欽斯 (或譯：哈欽斯) 的教育理念，例如：甘陽，〈大學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標與模式〉，收入甘陽等主編，《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頁 3-40。

<sup>11</sup> 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頁 197。

錢穆描述大學教育專業化的結果，同時涉及大學教授的教學自由及學生的選課自由。就選課制度來說，1922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過新的規定：大學推行選修制度。而這一制度是蔣夢麟、胡適以美國哈佛大學選修制度為模範移殖到中國來，對大學造成深遠影響。哈佛大學校長艾略特（Charles Eliot）是選修制度的推動者，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教育及科學研究，以取代古典的人文教育。錢穆認為「選科」和「選課」制度的實施，是造成中國社會分裂的重要因素。他認為大學教授只講授個人專長，使學生陷入一片「課程汪洋」，只學得一點支離破碎的知識。他認為大學課程專業化的影響，至抗戰時期終於暴露無遺。這一點無異暗示：抗戰期間的人才窘乏，應由錯誤的大學選課制度負起責任。

錢穆隨後從積極面提出大學教育的新宗旨：「通人」的培養重於「專家」。<sup>12</sup> 錢穆以「通人」與「專家」對舉，無非想要扭轉社會上重視專家、不重通人的成見。他比較中西政治、社會及大學的差異：

讀吾文者，必將以歐美大學制度為護符而生抗議。然歐美政治社會與中國未能盡同。必俟社會政治各色各部皆有中堅領導人才推動支持，撐得一局面，粗粗安定，粗粗像樣，而後專家絕業乃得憑藉而發抒。歐美社會政治各方面比較已有一粗粗安定像樣之局面，而中國則否。故中國大學教育所當著意培植之人才，自當與歐美稍異其趣。且就學術而論學術，一門學術之發皇滋長，固貴有專家，而尤貴有大師。大師者，仍是通方之學，超乎各部專門之上而會通其全部之大義者是也。一部門學術之有大師，如網之在綱，裘之有領，一提挈而全體舉。今歐美著名大學之講座，此等大師，往往有之。而中國輓近學術，一切稗販自歐美，傳其專業較易，瞭其通識則難。故今日國內負時譽之大學，其擁皋比而登上座者，乃不幸通識少而專業多。如此將使學者不見天地之大，古今之全體，而道術將為天下裂。昔者莊生之所怖，行且再見於今日。況歐美分系分科之制度，亦已漸為彼中有識者所不滿，而國內最近大學課程之變本加厲，則尚有非歐美之所能企及者乎。<sup>13</sup>

<sup>12</sup> 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頁 198。

<sup>13</sup> 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頁 198-199。

從這段文字看，錢穆對歐美學院概況絕非一無所悉。他對歐美社會和學院的認識，很可能來自《思想與時代》作者群，他們多半具有留學歐美大學的經驗，復懷抱人文主義的教育理想。<sup>14</sup>前引錢穆的觀點認為：首先，中國和歐美處於不同歷史階段，就當前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對通人的需要尤切於專家。其次，歐美大學的各個學術門類均有大師設講座為之主持，從而領導各學科的發展。最後，歐美專業化趨向在本國已備受批評，不幸中國的專業化傾向更為嚴重，故而鄭重呼籲，中國大學教育的方針及課程配置，均有根本變革的必要。

不止如此，錢穆在批駁專家之學的同時，更把矛頭指向專業化、職業化背後的實用主義，認為是近代中國大學教育的禍源所自：

必有為今日造就專家教育辯護者，其論點計必舉實用主義為依歸。惟即就實用言，通人達才之在今日，其為用尤急於專家絕業。十數年來，學者爭以文科為無用，而竭力提倡理科。彼不知一國社會、教育、政治、經濟各方面苟無辦法，則其自然科學亦絕難栽根立腳，有蒸蒸日上之望。今自抗戰以來，學風之變，激而愈遠。投考理學院之學生，群然轉嚮而考工學院。試問理學院無基礎，工學院前途何在？若就文法學院論，則哲學系早有關門之勢，最近文學系亦漸漸有追隨哲學系而閉歇之傾向。稍次為歷史系，較盛者為政治系，尤盛者為經濟系。試問一國之政治不上軌道，經濟豈能獨榮。亦未有其國人全昧於已往之歷史，而政治可以有辦法者。亦未有其人絕不通文學哲學，而可以通史學者。僅以實用主義談教育，必使學者專務於謀出路，尋職業，自私自利，祇圖溫飽。而整個教育精神，亦必陷於急功而近利，捨本而逐末。嘗發狂論，謂學者競捨理學院入工學院，更不如離棄大學而入汽車行之為愈。教育精神自有其大者遠者，此則惟通才達識者知之，擅一材一藝以絕業名專門者，往往不知也。<sup>15</sup>

<sup>14</sup> 何方昱對《思想與時代》作者群的教育理念有詳細介紹。何方昱，《「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時代》月刊(1941-1948)研究》(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

<sup>15</sup> 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頁201。

錢穆指出的是抗戰時期的普遍現象。誠如他所說：實用主義教育觀念的流行，已經導致人文主義的式微，文學院、理學院均受嚴重衝擊，而哲學系有關門之勢。<sup>16</sup> 重理工輕文法已經成為中國大學的基本格局，其後更延續半個世紀以上。錢穆認為若不挽狂瀾於既倒，技術教育將成為中國大學的主要標誌。

## 二、一個制度性改革方案

錢穆因應上述情況，提出一個制度性改革方案：用小型獨立學院取代現行大學。他的這一構想，最先見於〈改革大學制度議〉：

竊謂將來之新大學，應以單獨學院為原則。其主幹曰文哲學院、理工學院，其他如農學院、礦學院、森林、畜牧、紡織、漁業等諸學院，不妨各就需要，擇地設立。其年限不妨較文哲理工學院稍短。惟法律學院與醫學院，應以畢業文哲理工學院或肄業二年以上者入之，與他學院不平行。每一學院之學生數，以二百人至四百人為限，最多不得超過五百人。<sup>17</sup>

錢穆提出三種類型的學院：第一種是文理學院，這是他心目中最核心而基礎的學院。第二種是職業學院，它與文理學院平行設置，年限較短。第三種可稱為專門學院，是文理學院以上的職業學院。這三種學院的共同點，是規模細小，人數都不逾 500 人。

錢穆提出這一制度性的新構想，是為了改變實用主義影響下的大學教育。他在 3 年後撰寫的〈理想的大學〉，對這三種學院組織做更詳細的說明：

---

<sup>16</sup> 朱光潛描述：「目前，國立各大學中哲學特設一系者僅中央、武漢、中山三校，西南聯大與湖南二校則合哲學、心理學為一系，四川、廈門、暨南諸校均未設哲學系而隸哲學於教育學系。哲學為數既寥寥，而每校哲學系學生人數又甚少，有全系不及十人者。……此種現象殊可憂慮。」朱光潛，〈文學院〉，《教育通訊》，第 3 卷第 27、28 期合刊（1940 年 7 月），收入氏著，《朱光潛全集》，第 9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年），頁 35。

<sup>17</sup> 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頁 199-200。

理想中之大學校，實應以略相當於今日之所謂文理學院者為主幹為中心。其次不妨有各種有關於職業之專門學院以為之輔。而職業學院又當分為兩類。一者為對物的，一則為對人的。前者如工、農、商、礦、漁、牧諸學院，後者則如政治、法律、教育、醫學諸學院。當知後者之為業，其性質與影響，與前者絕不同。就前業者，僅使其人等於一機械一工具，有時亦可勝任而愉快。就後業者，決非機械與工具之所能勝其任，抑且其為弊害有不可勝言者。故以急切近利之眼光論之，第一種職業學院，不妨暫使其與大學主幹即文理學院相平行，而第二種職業學院，務必以超乎大學主幹即文理普通學院之上為原則。換言之，即非已畢業於大學普通文理學院者，即不得入第二種職業學院肄業。其各部門專門智識之研求，亦當列於大學普通文理學院之後。今試列表明之。

- 一、大學普通學院即文理學院→研究院，即文理各科之專門研究。
- 二、大學普通學院→第二種職業學院，即政法學院〔、〕教育學院與醫學院等。非先畢業普通文理各科，不得躐等修習，
- 三、大學普通學院→研究院→第二種職業學院。此為第二式之變通。
- 四、大學普通學院→第一種職業學院即工、農、商、礦、漁、牧諸專門學院，其年限或可較第二種職業學院短，然亦必先修大學普通科，再習專門，此在原理上應爾。
- 五、大學預科即大學普通文理學院之縮短年限→第一種職業學校。此為第四式之變通。

如此修習，庶可使學者皆得廣泛通曉人生基本而緊要之已往經驗，以長養其智慧，培育其理想，而不僅僅於謀一職業，求一智識，自成為一部門之機件與工具，以供現實社會之應用而止。而凡受此等教育者，庶使可以各本其智慧，發為事業，以運用社會，而使人生獲得更理想之進步。<sup>18</sup>

錢穆提出小型學院的構想，很可能欲提供當政者參考，做為改革大學教育之藍圖。<sup>19</sup> 新制的核心想法是：文理學院做為大學教育的基礎及核心，故從制度上規定，一切修習法、醫、教育學院的學生，都先須經過文理學院的教育。其中，

<sup>18</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頁 212-213。

<sup>19</sup> 〈理想的大學〉刊登於《思想與時代》雜誌，這是蔣介石資助及定期閱讀的刊物。參考：陳以愛，〈錢穆論政學關係〉，頁 156 註 1。

「不得躡等修習」一語，尤為新制的精神所繫。錢穆所殷切期盼的是，透過制度性變革來澈底解決職業化教育、專業化教育的偏失。

就學院內部架構而言，新訂課程以「分院不分系」、「先通後專」為原則。至其具體設計，則落實在「共同必修」和「選修」課程的配置上。錢穆詳細說明：

竊謂每一學院之課程，應以共同必修為原則，而以選課分修副之，更不必再為學系之分列。……此項共通必修之學程，應佔大學全學程二分之一以上。學者於研習此項共通必修學程之外，同時亦得各就性近，分習選科。……各學科之課程不必求備，各學者之選習，亦不必求專。要之大學教育之所造就，當先求其為通人而後始及於專家。而細碎無當大體之學程，則尤以少設為是。

關於理工方面，……竊謂亦當如文哲學院辦法，理工合院，不更分系，多授基本通識，……以藥偏枯之病。<sup>20</sup>

可知錢穆心目中的大學教育，不論是文哲學院或理工學院，都以「通識」為主體，盡量減少專業乃至「細碎」課程。即便理工學院學生，也必須修習歷史及哲學思想。課程重組的結果，以人文課程為全體學院共同基礎，由此重塑社會及政治領袖人才。可以說：這一個教育方案，在錢穆的人才救國論中，具有社會革新乃至政治革新的重要意涵。

值得指出的是，錢穆上述分院不分系、共同課程多、選修課程少的構想，與抗戰時期教育部主導的課程革新似頗接近，惟其動機卻截然不同。抗戰時期中國大學教育實施一次大規模課程整頓，論者認為具有思想控制、政治控制的目的。<sup>21</sup>此說可以解釋政治性課程的設置，卻無法充分說明語文及人文課程的規畫。就人文課程而言，尚應考慮人文主義者的教育理念。舉例來說：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教育構想，以及深受其影響的中國弟子吳宓對清華大學外文系的課程設計，即明白反對選修制度，認為應讓學生接觸永恆的人性及思想

<sup>20</sup> 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頁 200-201。

<sup>21</sup> 易社強(John Israel)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年)，頁 105-110。

問題。<sup>22</sup> 錢穆的構想與他們接近，他認為大學應以一套共同必修課為基礎，透過強制性的課程安排，使大學生接受人文教育的薰陶。這種人文主義者的教育構想，顯然有別於黨國體制下的政治意圖，意在培養一群富有教養的人類文明的傳承者。當然，這種課程設計容易被人聯想為與政府同調，但卻不宜把錢穆誤認為黨國體制的支持者。

話說回來，錢穆上述大學改制的構想，想透過制度性變革重塑新一代社會及政治領袖。他不無樂觀地認為，若可以用「不分系之學院制」改革現行大學，將使「人才蔚起」，國家前途有望。他描繪這樣一幅未來圖景：

創立不分系之學院制，其學成而去者，雖不能以專門名家，然其胸襟必較寬闊，其識趣必較淵博。其治學之精神，必較活潑而真摯。文學、哲學、歷史、政治、經濟、教育各面之智識，交灌互輸，以專門名家之眼光視之，雖若濫雜而不精，博學而無可成名，然正可由是而使學者進窺學問之本原，人事之繁蹟，真理之奧衍，足以激動其真情，啟發其明智。<sup>23</sup>

總括來說，錢穆對大學體制的嶄新規畫，意圖以「普通學院」實行通才教育，用「研究院」施行專門教育，與梅貽琦的〈大學一解〉觀念相接近，都是企圖以通才教育取代專門教育。<sup>24</sup>

不但如此，就更廣泛的層面言，錢穆認為「普通學院」的細小規模，可以針砭現代大學中疏離的師生關係，把頻繁的學潮和學運一掃殆盡：

誠使將來之大學，變為不分系別之獨立學院，其校長與教務長對於全校

---

<sup>22</sup> 白璧德對哈佛大學選修制度的批判，參見：Irving Babbitt,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Essays in 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8), pp. 72-87. 吳宓為 1930 年代清華大學外文系作課程規畫，以必修課多、選修課少為特色，更特為說明：「學生雖缺乏選擇之自由，而實無選擇之必要。因課程編制之始，已顧及全體。」吳宓，〈外國語文學系概況〉（1935），收入徐葆耕編選，《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200。

<sup>23</sup> 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頁 201-202。

<sup>24</sup> 梅貽琦，〈大學一解〉（1941），收入趙賡颺編著，《梅貽琦傳稿》（臺北：邦信文化資訊公司，1989 年），頁 497-511。

四五百學生之生活與性情，必能熟悉無遺。因材施教，始有可能。而全校教授，最多亦不致超出二三十人之數，可由校長教務長斟酌盡善而加聘請。其學術行誼，精神意氣之相投，較之今日一大學文法理工學院教授百許人相集合，牟牟然各不相認識，各不相聞問者，亦必判然有間。學者耳濡目染，較有軌轍可尋。教授之於學生，縱不能一一全識，亦必認得其十分之六七。（以不分系故）而學生之於教師，則大抵皆可全識，不致路途相遇，掉臂而過之。（以不分院故）所謂如家人父子然，以人格相感化者，不必在上者之提倡，而自有其境界。<sup>25</sup>

由上段文字可知，錢穆對現代大學中教師和學生的孤立和疏離有深切感受。他認為個人的孤立化，是現代中國社會動亂的來源。在他新構想的普通學院中，師生少而關係密，人格教育、道德教育皆可進行於無形中。就制度層面來看，遂不必架床疊屋，另立導師名目，使知識教育與道德教育分道而行，甚難收到效果。

熟悉中外教育史者不免感覺到，錢穆倡議的小型獨立學院（或稱普通學院）——尤其是文哲學院——與英國大學中的學院（College）或美國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或稱文理學院）的構想頗為接近。錢穆主張法律學院及醫學院與其他學院不平行，必須是就讀文哲理工學院或肄業 2 年以上者始可入讀，也似乎有取於美國大學院校制度。惟美國小型博雅學院以英國牛津、劍橋為模仿對象，故英國中古式大學才是錢穆心所嚮往的對象。的確，在錢穆提出上述構想之時，牛津、劍橋大學「閎通寬博」之風，時時在他懸念之中。<sup>26</sup>他在〈理想的大學〉一文，推崇牛津、劍橋大學體制，提出未來中國大學：

當略仿英國牛津、劍橋體制，推行導師制與小學院制，使學者各就其小團體之內，有師友長日相處觀摩切磋之樂。而今日大學厲行之學系劃分與學分考覈諸制，則大體徑可取消。<sup>27</sup>

錢穆對歐洲大學的教育精神和教育制度一向不乏推崇之詞。相較之下，他對美國

<sup>25</sup> 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頁 202-203。

<sup>26</sup> 錢穆可能是受到朱光潛影響，朱光潛從戰前就主張中國大學應仿效古代書院制及英國牛津、劍橋制。參見朱光潛，〈從教育部的幾種新政談到功令與學風〉，原載《高等教育季刊》，第 1 卷第 3 期（1941 年 3 月），收入氏著，《朱光潛全集》，第 9 卷，頁 59。

<sup>27</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頁 214。

教育精神和教育制度常常流露排斥心理。美國流行的實用主義觀念，尤其令他深致不滿，認為有悖人文教育的理想。

與此同時，錢穆的小型獨立學院構想，也有其來自本土的文化資源，此即中國傳統的書院精神及規模。不過，錢穆不同於民初某些老輩如馬一浮等，寄希望於傳統書院的復興。反之，他認為傳統書院不是萬靈丹，不可能也不必再走回頭路。他比較傳統書院與現代大學之後，認為現代大學亦自有其優勝處，若經過一番制度性改革，傳統書院的優點可以注入現代大學，創造一種融通中西的教育模式：

竊謂昔日書院舊制，雖有其特點，而近代大學制度，至少有勝於書院者兩端。一為講堂授課制。原原本本，首尾條貫，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昔人云：「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竊謂今之講堂制，苟遇良師，則一年授課，實勝如十年之勤讀也。二曰課目分授制。各就專長，分門別類，兼收廣蓄，不名一師，實足以恢張智慧，開拓心胸。較之煖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書院制所特勝於現行大學者，在其規模之狹小，師生有親切之味，群居無叫囂之習。若如鄙論，將來新大學以單設獨立學院為原則，則庶兼二者之長，而無二者之缺爾。<sup>28</sup>

就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我們不妨把錢穆提出的「小型獨立學院」構想，視為一種融通中西、新舊教育體制的嘗試。設一個比方，錢穆想借西方現代大學為軀體，召喚而注入中國傳統書院之魂魄。故此，「小型獨立學院」實是他會通中西文化的一種努力。

戰後局面急轉直下，使錢穆的「小型獨立學院」最後流於懸想。1940年代末錢穆流亡香港，與幾位學者共同創辦了私立新亞書院，專接收一群流亡的失學青年。細按新亞書院的教育規制，可以發現它實取於錢穆的教育理想，是一所融合中西教育精神及制度的教育實驗。錢穆在新亞書院〈招生簡章〉說明：

本院同人自身即以講學做人一體之精神相結合，共同有志於大學教育的改進，其自身即為一學術研究集團。將來對於書院內部一切措施，採絕

<sup>28</sup> 錢穆，〈改革大學制度議〉，頁 203-204。

對民主方式，由全校教授同人時時密切商討，以求教育精神之始終一致，與書院制度之不斷改進，期於理想的大學新制度作一長期之研求與實驗，將來粗有成績，可供其他大學之參考。<sup>29</sup>

可見新亞書院的創立，在制度上具有「實驗」的性質。在新亞創辦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堅持辦學初衷，其精神大致如錢穆對徐復觀所說：

只辦小規模學院，不擬擴成一完全之現代化大學，以求素來精神之貫徹。<sup>30</sup>

因此我們不妨說：新亞書院的理念與規模，是建立在錢穆對半個世紀中國大學辦學經驗的反省上。它從一開始就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及實驗精神，期望能建立一種「理想的大學新制度」，而絕不止是一所流亡學府而已。

### 叁、新亞書院時期：重振人文主義教育的旗幟

「我們該把『人文主義』的教育來糾正唯物的、功利的教育。  
……這是我們現代大學教育所應負的新使命。」  
—— 1950 年，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

錢穆及其同仁創辦香港新亞書院之際，目睹中國新政權以外來意識形態全面改造社會，提倡唯物論、階級鬥爭論，他深切檢討之餘，認為中國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失落，是造成當前局面的根本原因，而學院中人則難辭其咎。在這一個歷史時期，他顯然陷入「亡國」乃至「亡天下」的感受中。顧亭林《日知錄》卷十三〈正始〉云：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

<sup>29</sup> 錢穆，〈招生簡章節錄〉，收入氏著，《新亞遺鐸》，《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0 冊，頁 4。

<sup>30</sup> 錢穆，〈致徐復觀書〉（1954 年 4 月 1 日），收入氏著，《素書樓餘瀟》，《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3 冊，頁 332。

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sup>31</sup>

錢穆認為（中國）人文主義理想的重振，是當前唯一的解救藥方。但這一解救藥方，必須透過大學中的文科教育、通識教育才能夠達成。本節主要依據 1950 年錢穆在《民主評論》上發表的〈理想的大學教育〉，<sup>32</sup> 闡述他對中國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失落及重建之看法，並指出其作為一位人文主義者的身分認同。

## 一、文化主體性的雙重失落

首先，錢穆在〈理想的大學教育〉指出，一個國家的大學教育，為一國文教大業所寄，牽動一國之獨立自主地位：

任何一個國家，所能以存在而達於興盛，必然有它一段立國精神。那一種立國精神之培養保存與宣傳，則必待於國家之教育，而大學教育，則尤其是這一種精神之發源地與司令臺。所以一國的大學教育，乃是這一國家文教大業之所寄。由文教而培植出土風。士風所播，乃在全國政治社會各部門各方面發生一種領導力量。無形中，它是這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之中心集散點。必得明白了這一層，乃算明白了大學教育在整個國家中的真任務。<sup>33</sup>

這一段文字顯示錢穆深諳大學教育與國家政治的密切關係。他的話深究之下有兩層意涵：（一）他把 1949 年之後「以蘇俄為師」的政治現實，歸咎於「立國精神」的全面衰頹；（二）他認為中國大學未能培養出保存與發揚「立國精神」的人，是造成當前政治變局的根本原因。因為大學未能保存及發揚立國精神，政黨才起而領導全國政治及社會革新事業。

然則中國大學教育使命的失落，其歷史過程到底是如何？錢穆對此作出歷史

---

<sup>31</sup> 顧亭林著，黃汝成集釋，樂保群等校點，《日知錄》（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 年），頁 590。

<sup>32</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民主評論》，第 1 卷第 15 期（1950 年 1 月），收入氏著，《文化與教育》，《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41 冊，頁 219-241。

<sup>33</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19。

性考察：

近代新教育開始。那時如張之洞〔、〕梁啟超一輩人，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但那時又那裡有所謂中學呢？科舉八股可勿論，即就乾嘉經學說，也夠不上為中學建體。那時經學已走上末路，支離破碎，遠不是乾嘉之舊規模。那時的中國，正已學絕道喪，奄奄一息。國家文教精神掃地無餘，士風極度敗壞，政治社會各部門各方面，無領導，無支撐。正如一隻無舵之船，隨風飄盪，又值驚濤駭浪，相襲而來，顛覆沉沒，隨時可遇。……整個國家，根本沒有一個提綱挈領，由源竟委的學術中心與最高學府作領導。試問那裡稱得上所謂文教精神？若說有，那是在國外，不在國內。精神上，國家的領導權，茫無所歸，向外尋求，乞討徬徨。試問這樣一個國家，如何談得上建國？如何談得上政治社會各部門各方面之邁進？<sup>34</sup>

錢穆的中心意思是：自從中國推行新教育以來，大學始終無力承擔及領導全國思想及文化動向的責任，全國文教精神遂轉由外國輸入。綜觀民國時期，留學教育盛行不衰，即反映教育界無力凝聚及重建國家文教精神。

錢穆指出大學既然無力領導一國思想及精神，政黨中人便越俎代庖，「黨化教育」應運而生。他痛斥「黨化教育」的實施：

所謂黨化教育的主要意識，不外是強迫全國學術文化教育事業向某一政黨投遞無條件的忠誠降表。教育事業既不能善盡其對整個國家政治社會各部門各方面的領導作用，而整個國家的政治社會各部門各方面到底不能沒有一個領導的中心與力量。於是這一個領導全國的中心力量不得不別有寄託，而遂移轉到某一政黨之掌握。

今試問這一政黨又憑藉著何種力量來做全國政治社會各部門各方面的領導呢？順著上述中國近六十年來學術文化教育之大趨勢，這一個政黨，自然也只有向外襲取，徬徨乞討。晚清時期的教育理想，是學習德意志與日本。民國以來，乃至於五四運動之後，由學習德日轉變成學習英美。今天的中共，由學習英美再轉成學習蘇俄。中國傳統文化，既然

---

<sup>34</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20。

一無所有，則終極所趨，只有全盤西化。<sup>35</sup>

錢穆在這裏指出了現代中國民族文化主體性失落的雙重意涵：起先，是「向外國學」；隨後，是「向政府學」。<sup>36</sup> 但不管是向哪一個學，文教責任顯然已經旁落，學院中人不再成為社會思想領導中樞。

錢穆進一步指出，中國民族文化主體性的一步步失落，其癥結仍在中西文化衝撞及融通的大問題，不幸知識人未能適切回應這一時代大哉問。他分析這一問題的性質：

近代一兩百年來的世界變動，其主要動力並不發生在中國。西方人在這一兩百年內發生了一種新力量，把整個世界變了。中國依然在舊世界的邊沿，一旦和此新世界接觸，中國也不得不變。但這一個變，並不是中國內部本身自己在變，而是在外面有一種新力量來逼著中國人變。中國人要追上現時代，它的問題應在如何把它原有文化打開一條生路，使和現時代接氣；又如何把西方現代的新文化，打開一條通路，使它和中國原有的舊文化接氣。這是現代中國人所特有的問題。<sup>37</sup>

如何能適切地融通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為中國開創出一條新路？錢穆強調這個艱鉅而不可逃避的問題，其答案仍必須從中國自身內部去尋找變革的因子，斷斷不能採取全盤割捨的西化方案。他的基本論調一向都是：

中國若果真能變，其最後必然得轉為內在的，自主的。即是說由舊中國變成新中國，只是將自己的舊變成自己的新，決不是全部割捨了自家，來另外換一個別人。<sup>38</sup>

錢穆也同時指出，抱殘守缺的態度，絕不可能應付如此艱鉅的文化重任。他對舊式學者的批評相當尖銳：

---

<sup>35</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22-223。

<sup>36</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23。

<sup>37</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24。

<sup>38</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25。

不幸道咸以來的中國學者，他們早已在學絕道喪之餘，只知抱殘守缺，孤芳自賞，只能頑固地把自己隔離在世界大變的新潮流之外，無法把中國的舊學術舊文化，打開一條生路，來與外面新變化鬥榘，使其血脈相通，靈氣相接。<sup>39</sup>

讀過這一段文字的人，應不致再把錢穆視為守舊派學人。正如某些論者指出，錢穆是積極思考及融會中西問題的學者，他不贊同的只是那種全盤去舊的極端主張而已。

錢穆揭示近代中國學者無可推諉的時代責任後，指出這一融通中西的工作，唯賴「通學」才能達成。他說：

我們需要一種「通學」，來融通古今，融通彼我。好把我們固有之舊，與他們現有之新，鬥接起來，溝通一氣，好讓自己本身變出一個自己的新來。這一番責任，仍然應該寄放在從事學術文化高深研討的最高學府，即大學教育的肩膀上，卻不能寄放在以爭取當前現實政權為主要目標的一個政黨集團上。<sup>40</sup>

錢穆把「大學」和「政黨」對照，強調文化主體性的重建，須倚靠學院中人來承擔，他的理由十分簡單：政黨以爭取現實政權為目標，註定他們無法肩負文化重建的責任。融通中西文化的工作異常艱鉅，只有仰靠「通學」，斷不可能由專家完成。這種「通學」，又必須具有民族、文化的獨立意識，絕不能把西方文化建立在中國文化的廢墟上。

言念及此，錢穆再次感慨近代中國學人缺乏民族文化獨立的意識。他批評「學術獨立」的口號雖響徹一時，人們卻未能瞭解「學術獨立」的更深一層意涵：

中國近代大學教育，只為留學教育作準備，作過渡。這一層，中國學者間最近也曾感到不滿，於是有學術獨立的新口號。但所謂學術獨立，不過在求中國自設研究院，招請西方學術專家來中國設講座。把此手續，來代替派留學生，好讓中國國內大學漸漸與國外大學爭取學術水準上的

<sup>39</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26。

<sup>40</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26。

平等地位。窺他們的立論意向，實也未能觸及學術獨立更真更深的義蘊。<sup>41</sup>

錢穆的批評與陳寅恪的見解相當接近。陳寅恪在 1931 年痛陳中國學術的不獨立現象，以全國大學的國文系為例，認為「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內容」，而此「實係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sup>42</sup> 錢穆在〈理想的大學教育〉針對的對象，主要指胡適等人在戰後提出的〈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此前胡適撰文的目的，是希望中國儘快建立幾所具有世界地位的高等學府，更主張「今後中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發展」。<sup>43</sup> 但錢穆心目中的「學術獨立」卻別有一番意涵在，其主旨在期許中國學人對本國民族、文化精神之獨立地位，有深切之認識及闡明之能力。

錢穆認為最可衡量一國的學術及文化是否「獨立」的指標，表現在大學中的文學院及法學院之地位。然而，錢穆對這兩個院系的批評也最嚴厲，認為反映了文化殖民地的可悲狀態：

自然科學無國界，本無所謂獨立。……只有人文科學，關於某一國家之立國精神與其文化精神者，乃始有各自獨立之需要。今天中國大學教育所最感缺乏獨立精神者，其實並不在自然科學理工學院一面，而在人文科學文法學院的一面。尤其是法學院。中國大學的法學院，只有講述西洋各國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法律等各課程，中國已往的一概不提。好像中國已往一向無政治、無制度、無社會、無法律。縱使有課程，也無教師。有了教師，也無精采。只是姑備一格。……這才真是中國大學教育沒有獨立性的最嚴重病症。

法學院必應植基於文學院，文學院一應課程，如哲學、文學、史學之類，在中國大學裡一樣沒有獨立性，多半是一些抱殘自賞者在支撐門

<sup>41</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26-227。

<sup>42</sup> 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國立清華大學二十週年紀念特刊》，收入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361-363。

<sup>43</sup> 胡適，〈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原載 1947 年 9 月 28 日《中央日報》，收入氏著，《胡適全集》，第 20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234-238。胡適強調他主張的「學術獨立」的意義，「當然不是一班守舊的人們心裏想的『漢家自有學術，何必遠去歐美』。」其言似有針對《思想與時代》作者群的意味。

面。他們都已失卻在現時代的領導作用。文學院打不出一條生路，法學院必然隨著打不出一條生路，因而國家政治社會各部門、各方面都失卻了獨立性，必然要偏倚在一邊，必然要一面倒。那種偏倚和一面倒，根本也不由中主，不由內發，只如風吹草偃，東風吹來西面倒，西風吹來東面倒。<sup>44</sup>

這是錢穆批評人文學科無力承擔領導國家政治、社會走出一條生路來的責任。總之，他認定人文學科的失敗，是中國遭受挫敗的主因。往事已矣，未來究當如何？是錢穆接下來要回答的問題。

## 二、文化重建之路

因而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緊接著針對文化重建的需要，提出大學教育的具體改革方案。他認為唯有「通學」才能承擔融通中西文化的責任，「專門化」則是融通中西的障礙，也是文化重建的敵人。不幸中國大學長期施行專門化教育，文科學者已無力承擔文化重建的責任。因此他鄭重呼籲：應當建立一種以「通學」為基礎的專門教育。

讓我們再回到〈理想的大學教育〉一文，看看錢穆是如何從重建文化主體性的角度，說明大學教育中「通學」的重要性：

我們該把自己以往舊傳統，從頭體認，統體研討，再把世界新的，也兼陳諸異，博觀會通，把舊傳統與新潮流打通一氣，那時中國學術文化界，纔始能再抬起頭來，有新精神，有新理想。隔離新的，固是打不通。切斷舊的，一樣是打不通。……這樣的學術教育，影響到整個政治社會。……要求學術獨立，並不是深閉固執，其首先要務必在提倡「通學」。<sup>45</sup>

同時，錢穆剖析大學的「專門化」教育，認為是盲目模仿西方的結果：

---

<sup>44</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27-228。

<sup>45</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28-229。

西方學術界自有淵源，自本自根，遞衍遞分，枝葉雖繁，不害其同發於一本。流派雖別，不害其同出於一源。我們只外襲而取，但見枝葉，不見根本。只沿流派，不尋源頭。只看見別人家之專精，卻忽略了別人家之會通。別人家也是先由通學又漸趨於專精的，我們則學步人家之專精，而昧失其通學。如是則將永遠隨人腳跟轉。即就自然科學言，也將永遠無獨立自通之一日。

中國最近大學教育分院分系分科之支離破碎，國人也知厭倦，目之為鑽牛角尖。其病已見於自然科學的一面，而尤以人文科學方面者為甚。<sup>46</sup>

錢穆認為在「專門化」的趨向下，為今之計，應當轉而提倡「通學」，讓學子從根源處體認文化本源，再向專精化深入認識。

而錢穆所謂「通學」，即指學院中人應從文化大源來辨別學術分野，他這麼主張：

所謂「通學」，即是從文化大原來辨認學術分野。並不是在學術分野中割據一方，所能通透得文化大原的。<sup>47</sup>

如果把「文化大原」和「學術分野」代換為「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這兩個詞彙，錢穆的意思就更容易理解了。事實上，他正是從這一角度來看待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的關係。他認為人文學科是自然科學的本源，一旦脫離了前者，後者頓成無源之水。

就人文學科（文法學院）和自然科學（理工學院）的關係來說，錢穆認為人文學科是自然科學的本源，文法學院是理工學院的基礎。為學必須追本溯源，一切學術都須從文化大源來認識，才能體認到其真價值及真意義。反過來看，卻無從由自然科學來體認文化本源。不認識文化大源而發展自然科學，其結果不但於人類無益，且有大害：

自然科學也只是人類文化領域中一機構。游離了整個人類文化大領域，

<sup>46</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29。

<sup>47</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29。

將不會有自然科學。自然科學之一切觀點，一切辨認，全站在人類文化大領域的基點上而產生。在虎狼蜂蟻的生活中，決不能產出如人類般的自然觀念。科學真理，也必建基於人類自身的文化真理上。並不能游離人自身之文化真理，而獨立尋求出一種純自然的科學真理。所謂自然科學的客觀真理，依然附隨於人類文化之主觀真理的基點上，而始發現成立。昧失了人類文化大原，游離了人類文化領域，一切自然科學的種種真理將全不存在，至少將全部變質，變到與人類文化不相關。而且不僅於此，勢將變到對人類文化有害而無利。把末梢神經與中樞神經割斷，便不成其為末梢神經。把一切學術分野與文化大原相切斷，也將不成其為學術分野。學術專門化，若沒有一個總樞紐，把來綜結起，便成為學術之唯物化，學術之功利化，這即是學術之解體，即是文化之墮落，人生之倒退。<sup>48</sup>

錢穆在上面發出警告：游離了人類文化本源而獨立發展的自然科學，對人類將「有害而無利」。就學院關係而言，探討人類文化大源的人文學科，自應作為自然科學的「基點」。學習上的次序，也應明訂而取漸進方式。否則，脫離本源的各種專門研究，勢必造成「學術之解體」及「文化之墮落」。總之，沒有通學為基礎的專門學術，在他看來是極其危險，終會造成人類文明的墮落。

### 三、人文教育的陶冶

那麼以「通學」為基礎的大學教育，又應當如何培養人才？怎樣才算是一個理想人才呢？從這一篇文章看，錢穆提出的人文主義教育，不但以「文化」為核心概念，更極端重視「人」的培養。所謂「人」的培養，更明白地說，乃是對「文化人」的培養。錢穆寫道：

所謂如何做人，並不指做一個自然人，而指如何做一個「文化人」。人生自然只是一個自然人，必待人文教育之陶冶，而始成為一個文化人。<sup>49</sup>

---

<sup>48</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31-232。

<sup>49</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30。

錢穆把大學教育的重點，從「學科」轉移到「人」的身上。從上面的話看，他的「人文教育」的核心觀念，是培養出一群又一群的「文化人」。「文化人」指的是有「文化意識」的個人及群體。至其最高境界，錢穆稱之為禮樂人生。<sup>50</sup> 他認為讓這樣的人從事於專門之業，方能無弊。

更進一步說，當錢穆談到「文化」之時，他指的不是抽象概念。在他心目中，文化落實在每一個人身上。因此，必須維護人的完整性。這一事業，是大學的中心任務。錢穆說：

文化並不能憑空形成，必得落實在人身上。人必得是完整的一個人，不能把人專門化，只變成學術家、政治家、宗教家等等角色。<sup>51</sup>

這就是說，對人的完整性的維護，即是對文化的維護；對人的割裂，便是對文化的傷害。錢穆由此提出：若無法維護人的完整性，文化意識勢必墜地而盡。1970年，梅貽寶接任新亞書院院長一職時，即體察錢穆的教育宗旨而喊出了這樣的兩句口號：

我要高呼保持兩種完整：第一是學生的完整；第二是學術的完整。<sup>52</sup>

這樣對人的完整性的強調，乃是針對「現代化」方案中分化和分裂的趨向而發。錢、梅之用心所在，即大學教育應「避免、防止、抵制這種分化的潮流」，尤其應避免和抵制那種對人的分化的作為。

當初錢穆創辦新亞書院的時候，即從維護「人的完整性」出發，認為把人訓練成專家的教育，必使人陷入功利主義、唯物主義而止。推廣而及之於社會群體，便必蒙受物質主義的禍害，最終導致文化意識的全面低落，使人無法超拔於物質經濟的侷限上。他發出警告：

---

<sup>50</sup> 錢穆認為「惟有禮樂人生，始是經過教育文化陶冶的人生中之最高境界。」錢穆，〈第三期新校舍落成典禮講詞〉，收入氏著，《新亞遺鐸》，頁436。

<sup>51</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230。

<sup>52</sup> 梅貽寶，〈大學之道〉，收入氏著，《大學教育五十年——八十自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頁383-392。

若昧卻如何做一完整的人，專門教導他如何做一學家、政治家、宗教家等等角色，這便最多把人當成一件物，必然陷於個人功利的觀點下，使他只知有個人，不知有大群。相反的流弊，又將陷於社會功利的觀點下，使人只知有大群，不知有私人。在各個私人方面，把社會大群當作完成他私人功利的一個對象，一項工具，一種物件。在社會大群方面，也同樣把各個私人當作完成大群功利的一個對象，一項工具，一種物件。於是文化境界必然陷落在經濟的現實局面中，不能超越。人生境界，也必然再墮退到自然人生的領域中，不能躍起。偏向私人，其極將如狼如虎；偏向大群，其極將如蜂如蟻。完全只知有物質、經濟、自然、生存，而再沒有超乎物質經濟自然生存以上的文化意識。<sup>53</sup>

錢穆的這一段論述，是以唯物主義橫掃中國大陸為背景。在這一背景下，他強烈主張，對於人的完整性的維護，將決定文化意識的存廢死活。總而言之，錢穆把人的完整性與文化意識的保存做緊密連結。他指出這兩者的保存及培養，唯賴大學。大學教育若不能維護人的完整性、不能使人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社會將不再具有傳承文化意識的個人和群體的機制。到了那個時候，社會必定陷入物質經濟的全面壓迫下，成為一個虎狼蜂蟻的禽獸世界。

在此還應指出，錢穆對人的完整性與文化意識的保存之議論，並未侷限於中國民族及文化的立場，而是站在更普遍的人文教育的立場來發言。可以說，他所看重的是現代人的整全性及文化意識的保存，而不只是站在狹義的、傳統的民族主義立場上作思考的。為了清楚說明這一點，不妨引用錢穆在〈道統與治統〉（1945年發表）中的一段話，來說明他的人文主義教育理想：

人類教育宗旨，猶有超於造成健全國民之上者。若專以造成健全國民為目的，此亦尊治權於教權，重政統於道統，流弊之淺，將為狹義的國家主義，此必有損於文化教育之大全。若流弊而深，自必隨國家政策而定教育方針。……而教育乃全國人文元氣所寄，當樹百年不拔之基，豈能追隨政府當前政策為轉移乎？<sup>54</sup>

<sup>53</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30-231。

<sup>54</sup> 錢穆，〈道統與治統〉，收入氏著，《政學私言》，《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40 冊，頁 93-94。

這一段話展現了錢穆的人文主義教育立場，是一種相對於國家主義教育的論調。在他看來，人文教育、文化教育，才是大學教育的根本。故他斷然宣稱：以民族國家利益為考慮的國民教育，只能施之國小，不能施之大學。<sup>55</sup>

錢穆在〈理想的大學教育〉一文中，還比較了中西社會異同，認為中國大學在社會中所須擔負的責任，較諸西方大學在歐美社會的角色要更沉重，其理由在中國缺少西方社會的宗教力量、法律力量和文化力量：

在西方，尚有並未完全失效的宗教，尚有能納入於軌道的一套完整的法律，尚有社會間互相配合的種種風尚與習俗。整個西方文化，無形中在陶冶西方的整個人生。大學教育只是近代西方文化中一部門一機構。他們的大學教育，即使偏重在智識傳授，偏重在學術之專門化，在西方尚有全社會的文化潛力在指導着人生的嚮往。不比中國，自前清道咸以來，舊有的文化大體系，已在逐步的腐爛而解體。全社會的各部門，已在逐步的崩潰而墮落。整個人生失卻信仰，失卻領導，國家的法律，社會的風習，家庭的傳統，舊禮教的各方面，均已失卻了精神與力量。在中國的大學教育，其所應負的使命，顯然不能如西方近代的大學教育般，也只偏重在智識的傳授上。<sup>56</sup>

下面是他的總結性看法：

我們該注重會通的學風，該注重完整的人格。這兩件事，只是一件事。有會通的學風，自能培養出完整的人格。我們該把「人文主義」的教育來糾正唯物的、功利的教育。我們該從文化大原、學術大總綱處著眼下手。我們該提倡做通學，我們纔能期望有宏才。這是我們現代大學教育所應負的新使命。<sup>57</sup>

這是錢穆對於「大學教育所應負的新使命」的結論。這一理念反映在3年後的「新亞校規」中，即明白倡議：

---

<sup>55</sup> 陳以愛，〈錢穆論政學關係〉，頁172-174。

<sup>56</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232-233。

<sup>57</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235。

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你須在尋求偉大的學業與事業中來完成你自己的人格。<sup>58</sup>

我們可以看出在錢穆提倡的人文主義教育中，培養「通學」和「宏才」，是一體兩面的事。「通學」，是說到知識的整全性；「宏才」，是強調人的完整性。這兩個觀念的統一，即構成了錢穆的核心教育理念。

這樣看起來，錢穆一生的教育宗旨，確實可以用「人文主義教育」來概括之。他在這篇痛論中國民族文化主體性失落的文字中，最末尾以呼籲人文主義教育的重振作為結束。他在全文第七節中，頻頻留下這樣的字句：「非重張『人文主義』的旗幟不可」、「除非重來一次新的人文主義的教育精神，不足以資解救」、「除非自己有一套嶄新的人文主義的教育精神，解救不了這兩重的病勢。」<sup>59</sup>可見他是如何堅定地認為「人文主義的教育」是救治現代社會病態的唯一藥方，更配合他的其他論著，可以瞭解到「人文主義的教育」是錢穆認為中國傳統儒家教育的核心思想。因此，重振「人文主義」的教育，等於回歸中國傳統教育精神和教育理想。傳統和現代，在這裏得到辯證的統一。

#### 四、「文化積極」與「政治消極」

就當時的社會現實看，錢穆認為施行人文主義教育的最大阻礙，是大學門外的政府及政黨，難怪〈理想的大學教育〉最末一節，再次把重點轉回文化教育與政治體制的關係。錢穆認為能認識及發揮人文主義教育理想者，絕對不可能是政治人物；人文主義教育的理想，唯有學院中人才承擔，也必須承擔。他大聲疾呼：

新中國的政治家，若明白得這一番理論，他應該儘量容讓學術之自由，應該隨時接受學術界指導，這纔是政治的出路，也纔是中國之出路。至於今天中國的學術界，不足以擔負此一重任，則實是中國近六十年來一切病之最後病根；然而政治家終是無法越俎代庖，來肩挑這一個重任

---

<sup>58</sup> 錢穆，〈新亞學規〉，收入氏著，《新亞遺鐸》，頁 3-6。

<sup>59</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 235、238。

的。<sup>60</sup>

錢穆無疑在向新政府領導人喊話，然則此話豈不與虎謀皮？聰明如錢穆不可能不知曉，但依然做出這樣的呼籲，自是盡其知識分子的言責。不過，他對學院中人的失望之情，在文中同樣溢於言表。

文章最末尾，錢穆喊出「政治消極，文化積極」的口號，認為唯此才是正當出路，他依然從中國的歷史經驗分析起：

從中國歷史教訓看，從中國最近的現實狀況看，要求新中國之新出路，只有「政治消極」的一條路，可以走得通。政治家應該明白自己之功能與範圍。……興學興才，最少也是十年二十年的事，那是整個學術教育界的事。……中國的學術界，再也不該逃避這一個重任。這纔是新中國未來的大學教育所應負的新使命。

若說我言迂遠，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這也沒奈何。文化積極，急切不易有速效，因而政治只得是消極。消極政治中含有無限積極的用心。真夠得上政治家的，必能明白政治功能之局限，必能接受文化學術上一切經驗之教訓。<sup>61</sup>

可是在這個時候，中國新政權已呈現「君師合一」的新局面。新政府決心承擔政治和教育的雙重功能，以政治力量收編全國教育資源。錢穆的呼籲自不可得到任何迴響，這也是他心知肚明的事。

1950年3月，亦即〈理想的大學教育〉刊出後兩個月，錢穆草擬一份新亞書院〈招生簡章〉，其中概述他的人文主義教育理想：

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本此旨趣，一切教育方針，務使學者切實瞭知為學做人同屬一事，在私的方面應知一切學問智識，全以如何對國家社會人類前途有切實之貢獻為目標。惟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近來教育風氣，專為謀個人職業而求智識，

<sup>60</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238。

<sup>61</sup> 錢穆，〈理想的大學教育〉，頁239-241。

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專為智識而求智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弊。

本於上述宗旨，本書院一切課程，主在先重通識，再求專長。……務使學者真切認識自己之專門所長在整個學術整個人生中之地位與意義，以藥近來大學教育嚴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線上進，各不相關，支持破碎之流弊。<sup>62</sup>

錢穆草擬的新亞書院〈招生簡章〉，無疑是以他對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的深切反省為背景。20 世紀中葉是一個政治空前「積極」的時代，錢穆寄居中國南邊的英國殖民地，以流亡學者身分作出了「文化積極」的回應。香港新亞書院的創辦及其教育規畫，必須從這一背景中來認識，才能明白它在文化重建中的地位，以及其中所蘊含的人文主義的理想。

## 肆、籌辦香港中文大學時期： 文科教育的地域性與世界性任務

「人文主義的新教育，……勢必植根奠基於現有世界人類各民族所自有之文化傳統，而更加以擴大與融通。」  
—— 1956 年，錢穆〈當前香港的教育問題〉

上一節指出 1949 年錢穆在「亡國」更「亡天下」的雙重感慨中，唯寄希望於人文主義教育的重振。在這一時期的論述中，大學教育的文化任務與立國精神的政治任務，在錢穆筆下有較多連繫。惟執教新亞書院十餘載以後，特別是 1954 年雅禮協會開始資助新亞書院，1950 年代末港英政府決定成立香港中文大學以後，錢穆對大學教育的地域性和世界性任務，重新做了一番深沉思考。這一部分的思考內容，特別著重文科教育的使命之再省。這一階段最重要的文章，應是 1963 年發表的〈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把這篇文章與〈理想的大學教育〉（1950

---

<sup>62</sup> 錢穆，〈招生簡章節錄〉，收入氏著，《新亞遺鐸》，頁 3-4。這篇簡章的若干意旨，也見於 1949 年 10 月 10 日錢穆在亞洲文商學院（新亞書院前身）開學典禮講詞，更系統而正式地表述了錢穆的教育及文化理念。

年刊出)對照,可以發現錢穆對大學文科教育的論述,發生了從「國家民族」到「天下一家」的微妙轉移。若欲理解錢穆一生的教育宗旨,實不可不細讀這一篇〈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本人認為錢穆撰寫這篇文章時,不啻總結了他對大學教育的理念,並且得出他的晚年定論。

## 一、人文主義教育的世界精神

考察錢穆對大學文科教育的地域性或世界性任務之觀點,不妨先回顧他對中國第一位偉大教師孔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精神的評價。錢穆在《國史大綱》闡述孔子的文化理想,認為具有「天下一家」的特色:

孔子周遊,其抱負並不在為某一國、某一家,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孔子實已超出當時狹義的國家與民族觀念之上,而貢獻其理想於當時之所謂「天下」。(在今人視之,孔子只在中國境界內活動。在孔子當時,則實為對整個人類之文化世界而服務也。)此種遊仕精神,為後起學者所仍襲,到底造成了一個大一統的中國。(當時則已為「天下」。) <sup>63</sup>

這是錢穆對中國傳統教育精神的理解和詮釋,卻也有意無意間蘊含了他個人的文化及教育理想。他指出,教育應當「超出當時狹義的國家與民族觀念之上,而貢獻其理想於當時之所謂『天下』。」我們不難看出,「對整個人類之文化世界而服務」,也正是錢穆認為教育的終極意義。瞭解到錢穆傳承及嚮往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便不難理解到他論及近代中國教育及香港殖民地教育時,其所懷抱的人文主義教育理念也含有超越地域的「天下」意識。

不過,我們仍然必須面對一個問題:錢穆一生撰寫過不止一篇極富民族文化意識的文章,這是否與他的上述觀點存在矛盾呢?此處不妨舉出抗戰之際,錢穆的〈從整個國家教育之革新來談中等教育〉一文作為例子。當時錢穆在文中痛陳當前教育流弊,流露鮮明的國家民族意識:

---

<sup>63</sup> 錢穆,《國史大綱》,上冊,收入氏著,《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7冊,頁109-110。

今當針對時弊，提出兩口號：

一曰「文化教育」。

一曰「人才教育」。

此兩口號亦互為表裏，乃主以國家民族傳統文化來陶冶真切愛護國家民族及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人才。……此種人才，求其能真切愛護國家民族，求其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則必以國家民族自本自根之傳統文化為陶冶……。<sup>64</sup>

錢穆不斷強調人文社會科學的地域性質，認為教育應以「國民民族傳統文化」為基礎，要以「國民民族」為對象，要造就「國民民族」需要的人才。他所重視的「文化教育」和「人才教育」，似乎一概以「國家民族」為範圍及對象，令人覺得他似乎是一位國家民族至上論者。

不僅如此，他創辦香港新亞書院之際，雖明白拈出「人文主義教育」的宗旨，卻也把個人理想與「國家民族」緊密相繫。他在〈我和新亞書院〉一文中指出：

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和商業化的都市，我們所以要來講中國人、中國民族、中國文化的前途，就是認為我們的前途寄託在國家民族的前途上。假若國家民族沒有前途，請問我們做人的理想、事業、希望與意義價值，又將在那裏？……我們新亞書院的意義和價值，即是寄託在對國家民族前途的信仰上。因此，我們的校慶也與「雙十」國慶日是同一天。<sup>65</sup>

就這一論述來看，「做人」的理想似乎是依附於「國家民族」的前途上，並不占有一個獨立乃至超越性的地位。1959年新亞校慶暨國慶日講詞中，錢穆甚至說出：「我們要做一中國人的那一口氣，至今仍未出」，而且激憤地宣稱：「不信仰中國，不願做中國人者，不必進新亞。」<sup>66</sup>

---

<sup>64</sup> 錢穆，〈從整個國家教育之革新來談中等教育〉，原刊於1942年2月《大公報（重慶）》，收入氏著，《文化與教育》，頁261-262。

<sup>65</sup> 錢穆，〈我和新亞書院〉，收入氏著，《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頁466。

<sup>66</sup> 錢穆，〈讓我們來負擔起中國文化的責任——國慶紀念暨第二十二次月會講詞〉，收入氏著，《新亞遺鐸》，頁236-238。

可是，綜觀錢穆一生的教育及文化論述，上述對「國家民族」的「獨特的文化立場與創建精神」之強調，是與抗戰救國、戰後變局、殖民地生活的特殊背景很有關係。惟從撰寫《國史大綱》以來，錢穆從未真正放棄超越國家地域的人文主義教育理念，反而時時流露對於「天下一家」的嚮往。他在 1952 年發表〈新亞書院沿革旨趣與概況〉中，一度拈出兩大「熱望」：

本院竊願以發揚中國傳統的人文主義精神與和平思想為己任……，亦為…他日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理想之良好的負荷者。……使其既知祖國之可愛，亦知世界大同之可貴。<sup>67</sup>

他在 1956 年的一篇講詞中表示：

今天的世界，已是在走向大同的路上，中國人不能關着門做中國人。中國人必得站在世界的立場上來做一個人。因此每一青年，我們該指導他們，如何瞭解世界人類文化所包涵之大意義，及其大趨向。<sup>68</sup>

可見錢穆在華洋雜處的香港社會中，實明白到文化相通的需要和意義，並對此宣諸於口。

不過，錢穆認為人類文化的會通之道，仍應以各民族所自有的文化傳統為根基。下面可以用他在 1956 年發表的〈當前香港的教育問題〉來說明他的這一教育理念：

我們決不認為，除卻語言教育與職業教育之外，人類更無重要的教育功能之存在。同時我們也不認為超乎國家與民族之界線之上，人類更無一種更高遠的「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打通此諸壁壘，而為人類謀共通之福利。……但我們雖高提理想，有意指出一種與當前人類文化創新需要相呼應之人文主義的新教育，而我們則仍認為此一種教育，勢必植根奠基於現有世界人類各民族所自有之文化傳統，而更加以擴大與融通。若使先抹殺了其民族自有之文化傳統，則將感無所措手，而更高一層的教育理想，終必無從實現。因此我們在中國社會談教育，實有強調中國

<sup>67</sup> 錢穆，〈新亞書院沿革旨趣與概況〉，收入氏著，《新亞遺鐸》，頁 7-8。

<sup>68</sup> 錢穆，〈農圃道新校舍奠基典禮講詞摘要〉，收入氏著，《新亞遺鐸》，頁 92。

文化傳統之必要。但我們並不想在狹義的民族觀念與狹義的國家觀念之下來談文化傳統，而有其更高一層來為世界人類文化創新，奠基石，闢新路。因此，此一理想，與此一工作，乃倍見其艱巨。然而，我們又認為，香港則正是努力從事此一種新理想主義教育工作的適宜的好園地。<sup>69</sup>

這是錢穆經過深思熟慮後的看法，其表達的精神是超越中國民族文化之上的普世情懷。不過，錢穆同樣明白地指出，人文主義教育的世界精神，必先表現為對自身文化傳統的尊重及認識。他初次發表對於創立一所中文大學的看法，也提出了很相近的見解：

就世界人類文化前途言，中國民族擁有五千年優良文化傳統，在香港辦一所中文大學，應以注重闡揚此一文化傳統為主，而再以謀求中西兩大文化系統之溝通，此對世界人類和平前途必有大貢獻。<sup>70</sup>

上面的一種主張，實是錢穆的一貫看法，同樣也表現在他對香港中文大學的創辦及前途的認識上。

## 二、大學文科教育的特殊使命

1963 年，錢穆為即將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撰寫〈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可說最清楚地闡述他以國家民族文化為基礎，進而追求人類理想新文化的理想。這篇文章完整地陳述了錢穆對這所新大學的理念，值得在此詳細徵引，以引起學界的注意。此文開宗明義地提出：

一所理想的大學，同時該具備兩項特質，一是其「共通性」，另一是其「特殊性」。所謂共通性者，亦可說是「世界性」；所謂特殊性者，亦

---

<sup>69</sup> 錢穆，〈當前香港的教育問題〉，原刊於 1956 年 8 月 1 日《星島日報（香港）》，收入氏著，《文化與教育》，頁 365-366。

<sup>70</sup> 錢穆，〈歡迎英國大學委員會代表福爾敦博士訪問本院講詞〉，收入氏著，《新亞遺鐸》，頁 240。

可說是其「地域性」。<sup>71</sup>

可見他認為大學教育應具備「共通性」和「特殊性」，兩者不相衝突，而且相輔相成。下面再來看一下錢穆的相關論述。

錢穆認為，大學想達到「共通性」與「特殊性」，或說「世界性」、與「地域性」的妥善配合，必須具體考慮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教學內容配置，以及這兩種學問的相互關連性。他先論自然科學：

關於自然科學理、工、農種種方面，原理原則全是共通的，科學無國界，但一所理想的大學，應該就於此等共通的知識而應用到各別的地區上，發展出各別的，因地制宜的，各種不同的實際應用來。

若使一所大學，關於理、工、醫、農種種自然科學方面，僅能追隨着世界共同水準，而沒有注意到各地的特殊需要與其特殊發展之可能性，則此一所大學，依然有其不夠理想之所在。<sup>72</sup>

再論人文科學：

關於人文科學文學、藝術、歷史、哲學、政治、社會、法律、經濟等等科目，其內容遠與自然科學方面者不同。各民族各地區，相互間各有相異之傳統，甚至互不相曉，互不相習。因此，在今天的世界，關於此一方面之知識傳授，與夫人文陶冶，很難有一種共通的尺度與共通的規範。而且也不應該有一種共通的尺度與共通的規範的。

每一個民族，各有他們特殊的語言文字，各有他們特殊的文學藝術之愛好，各有他們的宗教信仰、與夫哲學觀點，各有他們的思想方法，各有他們的歷史傳統、人生習慣，與夫政治社會種種不同的現實情況。一所理想的大學，正貴在此方面具備他的深厚的特殊性。<sup>73</sup>

但他承認人類的共通性：

---

<sup>71</sup> 錢穆，〈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收入氏著，《文化與教育》，頁 243。文末註明：「約民國五十二年為香港即將成立中文大學作」。頁 249。

<sup>72</sup> 錢穆，〈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頁 243-244。

<sup>73</sup> 錢穆，〈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頁 244。

但世界已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同一的世界了，人類在其本源上，及其性質上，也本是同一的人類。人與人之間，有其共通性，將來的世界，正該在此共通性上努力發展。一所理想的大學，在此方面，正負有其更重大的意義和使命，正該在人文科學方面，大量發揮此項重大的教育功能，使全世界各民族，各文化傳統，能日趨調和合一，民族與民族間不再有隔閡，文化與文化間不再有衝突。一所理想的大學，正貴由其特殊性的人文教育，而到達一種共通性的世界精神與世界理想，這毋寧是今天的大學教育所應負起的一個更偉大更重要的責任。<sup>74</sup>

錢穆的觀點是明確的：不論是自然科學或人文科學，都應兼顧「共通性」和「特殊性」的雙重面向。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差別僅僅在於：自然科學從共通性而注意到應用的特殊性；人文科學則從特殊性而達到各民族文化的共通性。並且，他認為今日大學人文科學、人文教育所肩負的任務，是較諸自然科學「更偉大更重要的責任」，這裏可能暗指新亞書院應起而承擔這個偉大而重要的使命。

再者，錢穆拈出人文科學、人文教育的理想後，特別強調人文教育必須重視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才能最終達成對人類世界的共通性認識：

在人文教育的立場上，我們再不應該只顧到各自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來加深各民族之隔閡，和各地區之分離，而該朝向一個世界之共通性上去發展，此種需要與趨勢，誰也不該否認。但就教育功能言，必然將注重其特殊性，才能達到一種共通性。換言之，只有在個別的教育上，才能到達一種共通的理想。若我們抹殺了此一特殊性之重要，單獨舉出某一種尺度和規範來施教，來求此項共通要求之到達，則在人文教育方面必然會失敗。<sup>75</sup>

錢穆的意思是說，探索人類文化的共通性，是各民族教育的共同趨向；但在實踐過程中，必須充分尊重及闡發各民族的特殊性，才能達到人類文化的共通性認識。就教育實施而言，若不尊重各民族的特殊性，就不能達到人類文化的共通性。

---

<sup>74</sup> 錢穆，〈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頁 243-245。

<sup>75</sup> 錢穆，〈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頁 245。

說到人類文化的共通理想，錢穆指出這是「中文大學」最應當、也最可能做出的貢獻：

關於人文科學屬特殊性的方面，在我認為，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若真能完成其使命，實對於當前的大學教育所當擔負的世界性的共通理想，可能有其更特殊的貢獻之所在。<sup>76</sup>

錢穆之所以深具信心，其理由實在於：

不僅中國文化有其悠久的傳統，有其深厚的個性，在將來多采多姿的世界人類一個共通的新理想新文化之產生與完成上，一定有其偉大之貢獻；尤要者，在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及其教育理想，自始即深蘊有一種共通的世界性之存在。……似乎從中國人的理想看來，民族相異是可以把文化和教育的功能來使之融和合一的。在世界全人類之上，在中國人觀念中，還保留着有一個「天」。中國人的終極理想，則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而達於「天人合一」。因此，在中國人的想像中，民族界線，不該是一條不可泯滅的界線；而信仰衝突，亦不是一種不可解消的衝突。

由於上述這一觀點，在我認為，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如能在人文學科一方面，儘量發展其固有的特殊性，卻可同時到達現在世界的大學教育所應到達的，在此一方面的共同理想與共同責任之新需要。再換言之，中國已往傳統的那一套人文教育的理想，在我認為，是有許多重要之點可與此後世界新教育所應追求的共同理想，有其遙相符合之點的。<sup>77</sup>

這是錢穆回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與教育理念之後，認為中國古人的「天下」觀念，是進而達到「世界大同」的基礎。中國人的這一思想特性，使他們對中國文化的闡發工作，可以肩負起促進人類世界的「共同理想與共同責任」。此即在錢穆看來，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性的傳承與闡發，將同時達到對人類文化共通性的理解及發揚。特殊性與共通性沒有排斥性，在此反而是相互發明、同時俱進。

---

<sup>76</sup> 錢穆，〈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頁 246。

<sup>77</sup> 錢穆，〈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頁 246、248。

錢穆的這一看法，固然建立在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上，同時也應考慮到中文大學的成立背景。<sup>78</sup>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積極籌議成立，新亞書院做為一所強調傳承中國文化的學府，它到底是否能與另外兩所學府——包含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崇基學院——通力合作、聯合組成一所嶄新的高等學府？再進一步說，以中文教育為主的這所新大學，在強調中國語文、中國文化的獨特性之時，又能否發揮融通中西文化的責任？這一問題，也涉及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關係，到底這兩者是否存在不可消解的衝突呢？抑或是各有界域而又相互補充？錢穆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認為問題的答案乃是肯定的。不過，他為此重頭思索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教育精神，最後才鄭而重之地指出：中國文化本來具有濃厚的世界精神，闡揚中國文化不會也不應排斥其他文化系統中的理想成分。反之，對中國文化的深切體認，只會加強及促進中國文化對世界新文化的貢獻。

走筆至此，錢穆似乎意識到他過去一再強調的國家民族精神，以及新亞同仁的文化理想，或許與這一論點存在若干緊張性，這不禁使他感到，這一回歸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教育理念，一時或不容易為同仁接受；另一方面，他對中國文化的這一闡釋，以及中國文化對人類文化所將做出的貢獻，恐怕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故用下面這一段話作結：

如我上述之一觀點，非從中國文化之全體系中來詳細闡發，非從中國的哲學思想、人生觀點、與夫教育理論之各方面來詳細闡發，而單單如我上文之所述，或許不易得別人之信服與瞭解。而且近百年來的中國，因於西方新教育思潮之湧進，也從未曾對其自己傳統的教育精神與教育理想有所注意。在中、小學方面，一意灌輸國家思想與民族觀念；在大學方面，則個人主義的色彩極濃重，雖對自然科學方面，有意追隨世界水準，但亦忽略了因地制宜的特殊應用。至於人文學科方面，則完全失去了應有的個別性與獨立性。

但無論如何，將來真有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出現，應該能對符合世界理想的一種人文教育方面有特殊的貢獻，則是必然的，而且也是相宜

---

<sup>78</sup> 新亞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背景，可參考周愛靈著，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年）。

的。<sup>79</sup>

這是錢穆對即將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的定位及寄望。他在這裏透露出一種信心：一旦這樣的大學出現，以中國語文、中國歷史文化為教授對象，必定能對「符合世界理想的一種人文教育」做出特殊貢獻。

總結來看，結合特殊性和共通性，追求超越國家民族之上的人類共同理想和共同責任，是錢穆一生追求的終極境界。從錢穆的眼光看，這也是孔子的文化理想。錢穆以孔子的繼承者自居，讚許孔子的天下觀念。他在九十六之年，最後口述而成的〈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末段論「天下」，認為是中國人文化的特色：

中國人最喜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廣大，其涵義即有使全世界人類文化融合為一，各民族和平並存，人文自然相互調適之義。其他亦可據此推想。<sup>80</sup>

可見「全世界人類文化融合為一」，確是錢穆一生嚮往的終極境界，也是他認為中國文化有特別貢獻於人類之處。而他的「天下」，是以中國文化為其主要內涵、乃至為其宗主的。<sup>81</sup>他認為中國人的人文理想，可以彌合由民族或宗教所造成的分裂，因此闡揚中國文化的理想，便是貢獻於人類文化的融合。<sup>82</sup>姑且不論錢穆對中國文化及其他文化的認識是否確當，就他個人的主觀意願來說，他對香港中文大學寄予的厚望是明確而深遠的。50年後的中大師生，是否依然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以中國文化及世界人類文化前途為己任，值得今日中大人深思。

---

<sup>79</sup> 錢穆，〈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頁 248-249。

<sup>80</sup> 錢穆口述，錢胡美琦筆錄，〈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原刊於 1990 年 10 月 26 日《聯合報》副刊，收入氏著，《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43 冊，頁 423。

<sup>81</sup> 錢穆口述，錢胡美琦筆錄，〈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頁 423。這一點承陳榮開教授提示，謹致謝忱。

<sup>82</sup> 錢穆，〈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頁 246-247。

## 伍、結論： 錢穆論人文主義教育的失落與重建

本文的論述充分說明，錢穆不僅是一位熱愛「國家民族」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嚮往「天下一家」的人文主義者。與他同時代的少數學人，如朱光潛、陳寅恪、吳宓、梅光迪，都可以歸入同一傾向的思想家、教育家行列。他們因對若干傳統價值的肯定及闡揚，往往被人誤解為保守主義者，這是流於表面的膚淺說法。細讀錢穆的各種著作，可以發現他致力挖掘中國文化系統中足以與西方近代文明接榫的價值，並從儒家文化中找到許多相通之處。他縱使發表過不少表彰中國古人精神和思想的論述，卻仍不宜將其逕視為拒絕革新的保守主義者。不過，保守與激進為相對之概念，就此而言，錢穆當然可被列入保守主義思想家之列。

再從百餘年來中國歷史及大學教育的主流觀念來看，錢穆等人基於人文主義的立場，經常被迫處於「兩面作戰」的處境。他們的「敵人」既在校園外，也在校園內，其特徵表現為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科學主義。錢穆為此不得不與政府教育部主事者、新文化運動中的科學主義者，大學中的技術或專門教育者，保持一種疏離乃至對立的姿態。他基於人文主義的理想，對外堅持學院的自由獨立精神，反對政府對教育的干預及指導；對內主張人文教育，強調人類在精神層面的需求，反抗物質主義對大學的侵蝕乃至主宰。他的言論在廣大學生群引起相當共鳴，共產黨也把他列為胡適以外的另一反動學術權威，絕非偶然，這正證明了他在青年人中的影響力。但他做為大學的成員之一，始終未被納入為北京大學、西南聯大的核心圈子，而是以邊緣性、個人性的身分，提出他對現象沉思後的「政學私言」。

直至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的時期，錢穆的教育理想才在相當程度上得以實現。他的核心教育主張一直是：人文教育、文科教育應做為大學教育的核心。而為學與做人，則不應有所分離。在他看來，求學的目的，是要造就一個人的人格。他在「新亞學規」強調：「你須在尋求偉大的學業與事業中來完成你自己的人格。」而完整人格的成就，必須以求學為基礎。「新亞學規」把「求學與做人」並舉，指出兩者有密切關係，說明「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

做人。」但就錢穆來看，完成一個人的人格，仍具有最高的意義。從他指出「你須在尋求智識中來完成你自己的人格，你莫忘了自己的人格來專為智識而求智識」，<sup>83</sup>可以看出他的基本觀點：一個人人格的完成，才是求學的最高宗旨，知識永遠只占第二義的地位。故此，近人倡議的「為智識而智識」之說，在他看來並不具有充分合理性。就他而言，知識是為成就一個人的人格，本身不具有獨立自足的地位。

就知識而言，錢穆崇尚通學，反對專門化，其立場無比鮮明。他認為唯有通學，才能造就偉大的人格。居今日而言人文教育，更應盡力維護和培育人的完整性。在這一方面，他認為中國傳統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可以與西方的重要價值連成一氣，為中國人找到一條會通中西的路。他進一步希望，透過大學裏的制度建構，使人文精神所浸潤的文科教育為社會及國家培養領導人才。為了達成這一個理想，他終身針砭專門教育的不足，力圖重振人文主義的教育。他的大學革新主張，最終聚焦於文科教育的革新，以及人文主義教育的重振。他關切的問題是：中國文科教育能否成為培養融通中西文化人才之處？如何才能培養國家及全世界所需要的人才？他認為大學文科教育的責任是極其嚴肅的，一旦失敗了，其結果是災難性的。文科教育的失敗，過去導致中國文教精神的失落，未來也必無力解救人類於物質主義的深淵之中。

半個世紀以前，錢穆洞燭機先地指出：中西文化都已陷入物質化的田地，這是人類社會必須共同正視的巨大威脅。大學人文教育的重建，不止對中國人有重大影響，對全世界人類也有重大意義。人類要面對未來的世界，應攜手合作面對這一挑戰。然而，若不能在大學中實行「先博通後專門」，「先人文後科技」的教育，這一理想將永不能實現，人類前途也沒有希望。當年錢穆所指出的「虎狼蜂蟻的禽獸世界」，恐已涵養於大學的細碎專業科系之中。大學改制，大學文科教育的重振，其具有的世界性的使命，豈容低估！

---

<sup>83</sup> 錢穆，《新亞學規》，頁 3-6。

## 徵引書目

### 一、專書

- 甘陽等主編，《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
- 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 何方昱，《「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時代》月刊(1941-1948)研究》。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
-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
- 周愛靈著，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年。
- 易社強(John Israel)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年。
- 胡適，《胡適全集》，第2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 徐葆耕編選，《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
- 梅貽寶，《大學教育五十年——八十自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
-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 趙賡颺編著，《梅貽琦傳稿》。臺北：邦信文化資訊公司，1989年。
- 劉培育編，《道、自然與人——金岳霖英文論著全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
-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
- 錢穆，《文化與教育》，《錢賓四先生全集》，第41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
- 錢穆，《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錢賓四先生全集》，第43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
- 錢穆，《政學私言》，《錢賓四先生全集》，第40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
- 錢穆，《素書樓餘瀋》，《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3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
- 錢穆，《國史大綱》，上冊，《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7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1995年。

錢穆，《新亞遺鐸》，《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0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

薛光前主編，《艱苦建國的十年》。臺北：正中書局，1971年。

顧亭林著，黃汝成集釋，樂保群等校點，《日知錄》。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年。

Babbitt, Irving.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Essays in 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8.

Hutchins, Robert Maynard.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 二、期刊論文

陳以愛，〈錢穆論政學關係〉，《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2年第2期（2012年4月）。

